耀邦轶事

他的亲人中有威名赫赫的上将，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人向他投掷炸弹，他说：“不要紧，家乡人嘛！”件件鲜为人知，事事感人肺腑——

在胡耀邦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市流传着耀邦同志与家乡父老许多动人的故事。

胡耀邦和杨勇是表兄弟

曾任志愿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上将的威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胡耀邦与杨勇系嫡亲表兄弟，耀邦的母亲刘明伦与杨勇的母亲刘世珍是同胞姐妹。杨勇与耀邦还是同学。

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员陈世乔、甘恩藻组织的共青团秘密支部，一起投入到10万农军攻打长沙的行列，一起趴在学校的围墙上聆听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所作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又一起考入了浏阳中学。

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杨勇参加红军走了。不足15岁的胡耀邦则负责儿童团工作，后任少共书记，直到长征渡赤水时才与杨勇相见。

“孩儿回来了！”

自1930年11月胡耀邦被选派到湘东特委后，即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949年7月，浏阳解放了。胡耀邦的父母经过不少曲折后，总算与耀邦联系上了。那时，耀邦是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0年春，耀邦调任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他特意抽出几天时间，偕夫人李昭和3岁的儿子悄然回到阔别20年的家里。一进家门，耀邦便在年迈的父母面前跪下了，含泪说：“爸爸、妈妈，孩儿回来了！”

一家人悲喜交加，互诉衷肠。耀邦拉过儿子，叫他给爷爷磕头，并请祖父给孙子起了名字。以后耀邦便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赡养，尽一份孝心。

胞兄乃是农民

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杨尚昆主持的追悼会上，耀邦的家属中，有一位带着孩子的农村青年妇女，还有一位农家老汉。这3位便是从湖南浏阳文家市农村赶来参加追悼会的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以及胡耀福的儿媳、孙子。

总书记的胞兄弟是农民？中国哪朝哪代的皇亲国戚不是高官厚禄？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1982年，一位与耀邦曾在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干部，偶尔知道了耀福的两个儿子都在家中务农，他感到非常吃惊。于是，他为耀福的一个儿子找了一份工作，把招工的手续都办好了。不久，耀福上京看望弟弟，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谁知耀邦听了很生气，提出一定要将侄儿退回浏阳农村，还指示那位领导干部立即办好退回手续。他对那位领导干部说：’你这是拆我的台！”

一向不多言语、忠厚朴实的耀福这回可真是大发雷霆：“我当年出生入死闹革命，现在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参加工作，你不帮我解决倒还算了，现在别人好心帮我解决，你还要给我退回去，真是太不近人情，多管闲事！”一气之下，他离京返回浏阳，决定再不理这个老弟了。

后来还是耀邦托夫人李昭去浏阳做哥哥的工作，兄弟俩才和好如初。

耀邦给他松了绑

1962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耀邦多次到浏阳作社会调查，浏阳60多个乡，他跑了40多个。有一次，耀邦坐船沿浏阳河去青草乡。当船驶进青草港湾时，突然，有人朝船侧掷来一枚炸弹。“轰”的一声巨响，波光粼粼的浏阳河顿时水柱冲天，烟雾弥漫。耀邦乘坐的小船被水浪摇曳得险些翻了。警卫员敏捷地冲上船头，掏出手枪，瞄准岸上的投弹者，就要开枪。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耀邦一声断喝：“不准开枪！”他从船舱一跃而出，拦住警卫员。

警卫员擒获了投弹人，当着乡干部大声呵责：“这家伙竟敢谋害胡耀帮同志，现行反革命！”

乡干部们定睛一看，个个都瞠目结舌：那不是青草大队的捕鱼好手张新科吗？他怎么会谋害胡耀邦同志呢？

张新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炸鱼哟！用大了劲，没想把炸弹扔到了您的船边。我该死，我该死！”

耀邦笑着，双手扶起张新科，给他松了绑，毫不介意地说：“不要紧，家乡人嘛！”

张新科那年50岁，他惯用酒瓶装上土硝炸鱼，以前从没出过事。

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周　矢

这天，他趁天色好，想炸几十斤鱼。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枚土炸弹竟丢到了胡耀邦坐的小船旁。

张新科被耀邦的宽宏大量和谆谆告诫感动得热泪双流。

为家乡办实事

耀邦心里装的是全国人民，一直没有对浏阳有过什么特殊照顾。实际上，他也曾对浏阳“特殊”过一次。

那一年，耀邦的老家中和乡想办个小水电站，派人专程到京找耀邦要无缝钢管，耀邦当即回答：“到下面搞嘛，花这么多路费找我干什么？”

可是，家乡的人买来买去，跑遍了整个湖南，都没买到无缝钢管。电站不修了？不，还得上京找耀邦。于是，家乡人又上京了。

望着家乡人求援的目光，耀邦沉思了很久，才对来人说道：“中和是我的家乡，但更重要的是革命老苏区。当年我和公社领导算过一笔账，那地方每亩地就有一颗烈士的头颅！”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一亩地一颗烈士的头颅！古今中外哪有这样壮烈的事情！”

末了，他先让秘书与湖南联系，了解到湖南的确没有无缝钢管，才让秘书与别的地方联系，为家乡买了一点钢管。

这是他对家乡唯一的一次“特殊照顾”。

耀邦虽未给故乡有什么特殊照顾，但家乡人更加崇敬他。他们为家乡出了一个这么伟大、正直、廉洁的大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广州无线”一次性买断工龄

《钱江晚报》报道：当前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迫切需要改革，这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能否成功转换。广州无线电厂原总数近3000人的职工队伍裁减为目前的1800人，被裁减的1200名职工中，除极少数因劳动纪律极差等原因被除名外，其余的有权选择辞职、调动、“一次性买断工龄”或“离岗退养”，选择期限为半年。

该企业的有关领导对记者透露，被裁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目前已有330多人作出了这种选择。一般地，每年工龄的定“价”为1300元人民币。在“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中，工龄最长者达30年，如此长的工龄按每年1300元计则大约可获“利”4万元。但选择“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更多为拥有10—20年工龄的青壮年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职工将不再享受厂里的任何福利待遇，其生老病死等各种关系从此与厂里“一刀两断”。

“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做法在国有企业中从未有过先例，广州无线电厂此举无疑将具有不同寻常的探索意义。该厂的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谨慎表示，“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做法“好”或“不好”还“很难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次旨在转换经营机制而进行的用工制度改革，已然完全达到先期目标。（8.3 沈培兴荐）

拍卖，进入寻常百姓家

拍卖，近年来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议论的热门话题。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综合部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现已开始推出创意独特的「大礼拜拍卖会」，即在每月的大礼拜天举办常规家庭日用品拍卖会。据了解，「大礼拜拍卖会」以千家万户的普通百姓为服务对象，常年接受个人和单位的委托，拍卖其重复、闲置和积压的物品、高档生活日用品、特种纪念品、现代办公用品、家用电器、摄影器材、乐器、工艺美术品、高档玩具、礼品和各类首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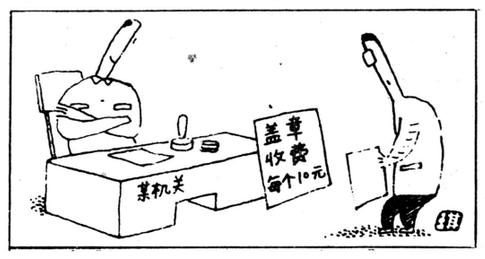
记者在「大礼拜拍卖会」办公室采访了几位前来办理委托拍卖手续和咨询有关问题的市民，大家都认为嘉德公司首创的「大礼拜拍卖会」形式，既能够营造活泼轻松的购物气氛，增加购物乐趣，调剂活跃市场，又能够再现闲置物品的经济价值，避免目前严重存在的社会性损失浪费。（《工人日报》8.28）

“人死了，脚还在动”

湖北黄石市自行车总厂破产后出现的现象正常吗？

《经济师》第7期刊载熊红英的文章说，黄石市自行车总厂由于严重资不抵债，于1993年8月24日经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即日起破产还债。破产后应做的事没有做，市里领导部门却布置他们利用现有设备、技术和场地，承揽各种业务，进行生产自救；从今年3月16日起，原自行车总厂又宣布恢复生产，而且厂部前贴出的通知要求全厂职工必须继续执行原自行车总厂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负责人说：“企业宣告破产后，财产应按法律规定进行清理，妥善保管，不应再进行生产活动。破产就像一个人死了一样，现在继续搞生产，那不是人死了脚还要动？”



生财有道　（《经济晚报》　张寿安荐）

南京将聘请外国人担任市府经济顾问

据8月16日《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将聘外国人担任市政府经济顾问，选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选聘对象为：在海外经济界、科技教育界有实力、有地位、有造诣、有声望，关心支持南京经济发展，并乐于接受聘请的实业家、管理专家、著名学者和其它知名人士等。（王水福）

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85亿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5亿。其中，90%的人口增长将在第三世界国家。非洲的人口增长最快，将增加116%，亚洲人口将增加47%，其中中国的人口将保持相对稳定；中美洲、南美洲将增加51%，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缓慢，某些欧洲国家甚至会出现人口下降，如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

二战以来世界发生的重大难民潮概览

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难民潮：1947年：大约800万人，大批群众离开他们在印度的家园逃亡到巴基斯坦，接着发生了印巴分治，大约有相同数目的印度人进行了另一方向的旅程，在途中大约有20万人遭杀害。

1954年：以色列国宣布成立，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阿以战争。大约8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分别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难民营定居下来。

1945年：由于越南分成南北两部分，大约100万难民从北方逃到南方。1975年4月南方被北方占领后大约100万越南人主要经海逃离国家。

1967年：在6天的以阿战争中，以色列占领西岸，耶路撒冷东部，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又迫使30万巴勒斯坦人逃亡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迫使难民逃亡到邻近国家，300万阿富汗人逃亡到巴基斯坦。

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军队对国内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的反判进行了镇压，150万库尔德人逃亡到土耳其和伊朗。

1992年：缅甸境内的30万人在受到迫害后逃亡到邻国孟加拉国。

1993年：大约70万人在布隆迪国内部落战争和一次失败政变后逃离自己家园，包括37.5万人逃亡到邻国卢旺达。

1994年：在24小时内，大约25万胡图族难民从卢旺达穿过边界进入坦桑尼亚；联合国官员称，这是他们所见到过的一次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难民潮。　（《上海译报》8.4）

卢旺达部族仇杀何时了？

据报道，卢旺达胡图、图西族仇杀再起，最近5天内已有200多人死亡，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

卢旺达为什么频频发生流血冲突呢？根深蒂固的部族矛盾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卢旺达主要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胡图人占85%，图西人只占14%。但是历史上，小族图西人占统治地位。1959年，大族胡图人起来造反，推翻了图西人几十年的君主统治。胡图人执政后，两族又多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为躲避屠杀，几十万图西人先后逃到乌干达和布隆迪等邻国，仅逃到乌干达的难民就达25万之多。

1990年10月，当时已任乌干达国防部副部长的图西人鲁维吉耶率领1000多图西难民打回卢旺达。他们要夺回失去的权力。

当时的卢旺达政府以种种理由拒绝难民返回。这支难民武装，即爱国阵线，在卢旺达北部同政府军进行了三年拉锯战。

在坦桑尼亚的调解下，双方经过许多轮谈判，终于在1993年8月4日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

由于双方在具体执行协议的过程中意见相左，爱国阵线拒绝参加胡图人控制的政府。

今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遭火箭袭击坠毁。卢旺达政府怀疑是图西人所为，因而爆发了内战。

在内战中死亡的大部分是图西人，爱国阵线指责胡图人政府军制造了一起起流血惨案。

眼下，爱国阵线已打败了政府军，成立了图西人控制的新政府。数百万胡图人涌入邻国，酿成了世界现代史罕见的难民潮。

尽管新政府一再呼吁难民们返回家园，但是他们害怕回国后受镇压。此外，不少溃退的前政府官员和政府军也随难民潮一起逃到扎伊尔。他们还带去了包括重型高射炮在内的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恐吓难民说，如果他们回去就会受到图西人的镇压。目的是为了在扎伊尔重整旗鼓，待时机成熟打回老家去。

胡图、图西人上台下台，真不知卢旺达的部族仇杀何时能了。（《粤港信息日报》94.8.6王能标文）

莫斯科郊外的“神秘金字塔”

莫斯科近郊的索夫里诺森林中，坐落着一栋外型如截短了的“金字塔”状建筑，其外表毫不显眼，但建筑物四周，密密麻麻布满了铁丝网，持枪警方昼夜不停地巡逻。在铁丝网外围，多处悬挂着令人生畏的牌子：“止步，禁止通行！禁区”。这座被称为“神秘金字塔”的内幕，鲜为人知，到1994年初，才被俄罗斯记者揭开。

这里就是莫斯科的“地下保卫者”——索夫里诺反导防御预警系统指挥所。它的使命是，为总统和国家军政领导人提供信息，以便最终作出是否要动用导弹核力量的决定。

索夫里诺反导防御预警系统指挥所是原苏联在60年代建立起来的。其预警站部署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以及其它地区，构成了总长5000公里的雷达屏障，可以发现并跟踪外层空间的目标。70年代，北极圈内、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预警站投入使用，其雷达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索夫里诺“金字塔”内装备着高效计算机，可以跟踪“太空战”；有各种电子设备、大功率冷却和通风装置；还有自动化电力网和工艺系统。它所配备的导弹有两类，一类用于大气层外拦截，一类用于高空大气层中作战。

在指挥所的总值班桌上，放着颜色各异的电话，它们分别与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人直通。迎面墙上镶嵌着大屏幕，屏幕上显示出航天器移动情况。各地区预警站主要是用来跟踪低轨道人造卫星的运动状态，近地宇宙空间的动态，以及进入其视野的一切运载火箭的发射情况。一旦屏幕上出现目标，预警系统很快提供诸如发射地点、导弹数目、打击方向、导弹轨迹、弹着点和飞行时间等重要信息，并输入专门的处理装置，启动总统的“黑盒子”。目前，这个彩色屏幕可汇集来自8个预警站的信息，其中5个已位于境外。

苏联的解体，使原来苦心经营的许多反导弹预警系统地面跟踪站已处在俄罗斯境外，且因多年失修，设备陈旧，有些已接近于报废。俄罗斯领导人对这行将倒塌的“金字塔”，已开始下苦功维护。

（据8月6日《解放军报》黄保林文）

雷击趣闻

57岁的电力工程师迪尔在25年前的一个雨天惨遭雷电击中。他说：“我感到电流从右肩入，左脚出。它把我轰飞50英尺，脚趾也脱掉几只。”

他获救生还，却从此不畏寒冷，每天都感到暖烘烘的，即使在在隆冬，气温跌至零度以下，他仍是只需穿着T恤短裤；如果是夏季，他就要把一袋袋的冰粒放进浴缸，浸冰水浴消暑。

库珀女士更加倒霉，一共被雷电击中两次，第一次在1983年发生，当时她在邮政局外，雷电首先击中一支旗杆，再进入她的头部。住了6天医院，她终于苏醒过来，但患了严重的短暂失忆，而且整天都口渴。出院后她经常做恶梦，心情极坏，终于导致和丈夫离婚。复原后，她发觉自己完全不懂得计数，不得不回到学校重新学习基本数学。

去年5月，库珀在家中听电话时，突然一声雷响，电流从左耳传入，遍击全身。这次她没有晕到，只有轻微烧伤。

汤普金斯是电力公司的技工，5年前在装设新电缆时触电，被7600伏特电流通过身体。他说：“我晕死过去，感到魂游体外，见到自己躺在地上。此时，旁边出现了一位天使，她安慰我，说时候未到，叫我重回体内，接着我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已身在医院。”

虽然捡回一命，但他已经丧失了部分记忆，经常失眠，又患上抑郁症，至今未能正常工作。（《青年参考》7.29）

毛岸青脑子被人打坏？

上海开庭审理一宗悬案

去年1月11日，上海市某报选登了北京作家张聂尔书稿《中国第一人》的有关章节，其中有一段写道：“董牧师对毛岸青拳脚相加，耳朵也打，脑袋也打，把他的脑子打坏了。”文中提及的董牧师即董健吾。

董健吾5个子女认为此说违背了历史事实，纯属捏造污蔑，诋毁了董健吾的名誉，也损害了董家人的形象，造成群众的许多误解。故于去年6月向上海市中级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两被告赔礼道歉，停止侵权，赔偿名誉、精神损失及因诉讼引起的经济损失1万元。

董健吾于20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担任了中共秘密信使，营救过党内不少同志，还奉命秘密护送美国作家斯诺赴延安。30年代，董健吾在上海的“大同幼稚园”抚养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还抚养了彭湃之子、蔡和森之女、李立山之女、恽代英之子等。

被告张聂尔在提交法庭的书面意见中说：“我书中的那段话，确实系师哲（毛泽东的翻译）所言。”法院立案以后，张聂尔又找过师哲，再次问他毛岸青的脑子是否被董牧师打坏，他肯定地说：是。并写下证言：“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检查身体时，发现毛岸青神志不清，岸英说是董牧师打的。”（《羊城晚报》7.27魏天祥荐）

他姓轩辕　全国惟其一家

从目前的资料看，姓轩辕黄帝的轩辕者，全国仅江苏省淮阴市泗洪县轩辕耀这一家。现为该县工商银行金鹰实业发展公司业务经理的轩辕耀也因此得到邀请，4月清明去陕西省黄陵县参加了黄帝陵的祭扫活动。

轩辕耀在得知自己的姓很“高贵”后，曾千方百计寻根，然而总未再找到第二个姓轩辕的人。他将自己的姓氏情况通报给陕西黄陵办，以期能找到同姓者。获悉有姓轩辕者，黄陵办领导很感兴趣，便向他发出了邀请。不过全国为何只此一家姓轩辕的，至今仍是有待考证的迷。另外他家如何姓上轩辕，和黄帝有何关系，也有待研究。因为黄帝时期，中国尚无文字。据历史考证，黄帝姓姬（亦说姓公孙），号轩辕。其后又分为颛顼等12支。黄帝之所以号轩辕。又是和这一氏族居住在河南新郑县轩辕山有关。（《大同晚报》5.27 吴重德 摘）

局部看问题　况贤忠画
（原载《长江日报》）

地球七大恶兆

●鸟类日渐销声匿迹——各种鸟类中，有2／3数量日减，1000种有绝种之虞；

●害虫日渐对更多的杀虫剂产生抗药力，至少有17种是任何杀虫剂都无可奈何的；

●海洋可食生物目前产量已达极限，平均每人可得海洋食物数量已见减少；

●谷物存量现处于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待供养的人口增加数字却以亿计；

●目前，遍及赤道以北的温带森林，其丧失程度超过热带雨林；

●难民人数创新纪录，有1900万人之多；

●已有22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500万人已发病，却仍没有找到根治艾滋病的最佳办法。　（《青年参考》安长军荐）

谁查出“狄克”是张春桥

葛正慧老人，身体硬朗，热忱而健谈。他生于1924年。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及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他早在50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张春桥”这一公案。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于是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笔名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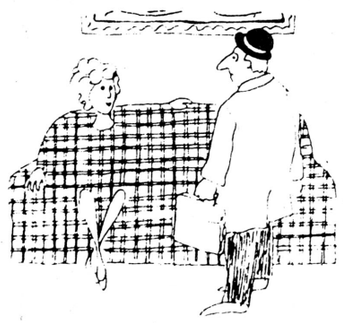
1953年的一天，葛正慧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1937年2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读到该书第104至105页，忽地眼前一亮，他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　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中流〉》：“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间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予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不言而喻；狄克＝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1937年，当时张春桥不过20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服务导报》8.7徐厚裕荐）



「用做沙发套剩下的布做的裙子」（《羊城晚报》七月二十六日）

沈醉回忆——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

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香港，曾去过台湾，后来去加拿大定居。由于他不得不靠写写回忆录以及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分析等等，来维持生活，然而能写的几乎都写完了，但他却没有勇气把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时那一段可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不辜负与他有过同事之谊，我就尽我所知来替他写。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投向国民党，这在当时，的确曾引起国内外许多人的重视。蒋介石在武汉很快接见了他，可只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这样一个无权的空头委员，并把他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估计了张国焘，都以为他至少在分裂共产党方面能起到些重要作用。

张国焘要求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戴笠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全部答应，成立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用来针对共产党的。每期挑选的学生都是一百五六十人。当时戴笠对这些毕业学生寄以极大希望，分配他们去西北前一再鼓励他们应如何竭尽全力去完成“领袖”赋予的“光荣任务”。可惜很快这一幻梦便被粉碎了。原来由张国焘亲自主讲的那些什么对共产党的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边区，怎样才能取得信任……，真正运用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几个张认为最得意可靠的学生，拿着他亲笔写的信去找他过去熟识的人，更是渺无消息，有去无回。戴笠一看急了。勉强把第二期办完，就宣布停办，张国焘也为此称病不敢去见戴笠，戴笠也急忙亲自跑去西北察看，不敢去见蒋介石。这一次实践证明，派人大规模打入边区的计划是失败了。

军统在抗战前就奉蒋介石之命一定要在延安建立一个情报站或小组，配备一部特工电台，多年来却一直未能实现。戴笠自得到张国焘后，满以为通过他的关系，一定会毫不费力地建起来，没有料到，张不但不能把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骨干拉出来，连打也打不进去。甚至张满口答应在边区建立军统组织这样最有把握的“小事”，也完不成任务而无法向蒋介石作交代。

最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是加强对边区外围的工作，先是在军统陕西省站之外，再成立一个陕北站，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活动。张还建议应在接近边区一些地方成立几个所谓策反站、组，据说这是要用“小虾钓大鱼”。可是我却没有听到钓了什么“大鱼”出来过。

大约从1943年以后，戴笠对这位“宝贝”也看透了，估计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大油水，有次，戴找张去曾家岩他家中谈话，我碰见张国焘垂头丧气走了出来。余怒未息看着门外说：“这人太不知好歹，他不要认为这样就可以对付得过去！”从那次以后，张很怕见戴笠。

我对张的印象是狂妄自大，生活上却相当腐化。特别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有些情况是当时派到他家中去照顾他生活的勤杂人员说出来的。这些人既是去照顾他的生活，也兼有“照顾”他思想言行的任务。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心诚意，凡去见他的客人在会客室和他谈话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把声音放大，怕别人误会。寄人篱下的滋味，使他变得如此小心谨慎。

我和张国焘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春初。我见毛人凤与他谈，希望他能留在大陆不要走，并说明这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他听了之后立即表示：他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却一再劝他留下来好，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谁都懂得，这虽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烦事。他几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

那次谈话中毛人凤已示意过，如他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

我和毛人凤送他出门登车后，我就问毛：“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

毛人凤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据沈醉著《人鬼之间》）